

---

# 中国经济: 稳定增长还是滞涨?

柳欣

<南开大学>

## 摘要

本文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笔者在 1998 年通过研究剑桥资本争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 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主流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 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 但在这个理论中, 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 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 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 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 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 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 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 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 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 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 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 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 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所要表明的重要一点是, 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的研究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它使以上理论和现实问题根本无法讨论, 而只有按照货币经济的思路, 才能理解和解释当前中国经济中所遇到的问题, 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复杂问题。自 1997 年以来, 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 失业大量增加,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的放慢,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大量城镇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下, 考虑到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医疗、教育费用, 实际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自 1997 年以来, 虽然中国实际 GDP 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8% 左右, 但每年新增的就业量却在下降, 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 1997 年以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教条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说, 自 1997 年以来支配中国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在经验上只有失败的教训而没有成功的经验, 如 70 年代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重滞涨和日本经济自 90 年代以来的长期停滞。本文认为, 自 1997 年以来中国经济并没有根本摆脱经济衰退而实现稳定增长, 而是出现了滞涨。

**关键词** 有效需求、货币、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就业

中国经济自 1997 年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随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 2000 年以后出口的大幅度增加, 经济增长率开始回升, 似乎摆脱了经济衰退和使经济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但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 从一系列统计指标和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来看, 自 1997 年以来的基本稳定在 8% 的增长率可能不是稳定增长, 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出现了类似于美国 70 年代和日本自 90 年

代以来的“滞涨”，而且这种滞涨的程度可能还是比较严重的，这正是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失业率上升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大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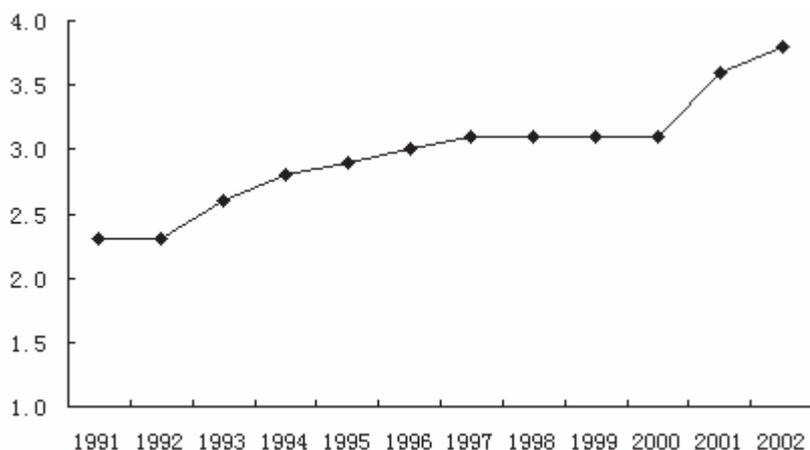


图 1 城镇失业登记率 (%)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下图表除另有说明外，均出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图 1 的表示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失业登记率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名义 GDP 和实际 GDP 的增长率虽然都在提高，但失业率却上升了，而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失业率也逐渐上升，这种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其值反映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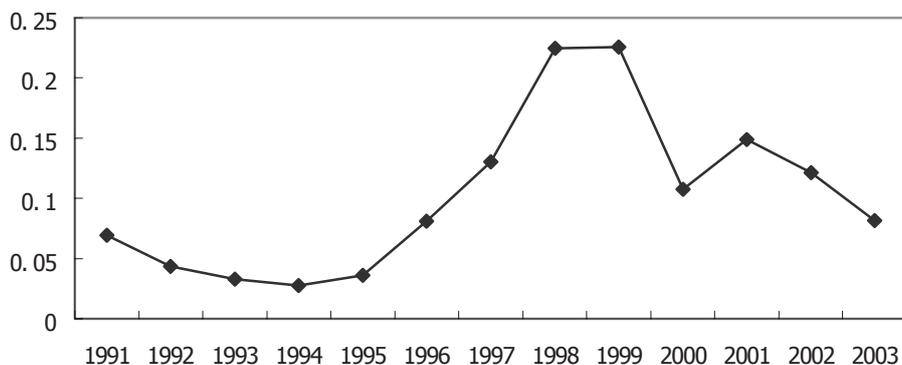


图 2 1991-2003 年中国就业弹性

图 2 反映了中国就业弹性变动的趋势，可以明显看出从 2000 年开始中国的就业弹性显著下降，目前中国总体就业弹性仅为 0.08（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 0.3-0.4）。另一个反映就业的指标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 1991-1996 年，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都超过 1000 万人，但从 1997 年后，这个速度大大降低了，在 1998-1999 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00 年后虽然开始上升，但每年转移的劳动力都在 500 万以下。从 1997 年至 2004 年的 8 年间，中国农村劳动力只降低了 1.4%，这比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时期 1 年的速度都低。这种高增长、低就业或

名义 GDP 的增长率与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滞涨”的典型特征。

第二，如前所述，由有效需求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产生于过高的资产值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中国 1991-1995 年平均的投资增长率超过 40%，最高的 1994 年达到了 62%，这使资产值大幅度上升，而工资在 GDP 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 1997 年的经济衰退。自 1997 年以来，这种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加严重了。在资产值方面，自 1997 年以来，虽然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但资产值上升的比率却超过投资的增长率，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很少破产使原有的资产值没有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投资更多地转向房地产、高科技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股市的大幅度攀升也使企业通过并购直接增加资产值和利润，这导致了 1997 年以来折旧在 GDP 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继续上升。如统计资料表明，从 1997-2001 年，折旧在 GDP 中的比重继续上升，如果考虑到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上升和折旧率只是机器设备的 1/3，则资产值上升的幅度要高于折旧的变动。同时，工资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继续下降。

在收入分配方面，自 1997 年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由基尼系数所表示的收入分配一直呈上升态势，由 1997 年的 35.98% 上升到 2000 年的 40.66%，2003 年跃为 45.8%，六年间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这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而与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拉美国家相近。在金融资产的分配方面，2002 年中国 8.6% 的富户占有 60.47% 的金融资产。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2000 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 48.01%，接下来的 2001-2003 三年中，消费倾向分别为 46.55%，45.30% 和 43.35%。消费需求的不足也正是中国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在讨论美国 70 年代的滞涨时表明，在经济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条件下，资产值的继续上升和工资在 GDP 中的比重继续下降是滞涨的主要特征。

第三，自 1997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发展出现了畸形化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除了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构成影响以外，还引发了对不同行业商品的需求状况的变化，由此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工资总量对 GDP 的比重继续下降的条件下，有些行业的工资率却大幅度上升，如房地产和金融业以及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大幅度上升，在整个消费需求和消费支出下降的同时，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却在持续上升，这就导致了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地向高收入阶层倾斜。

自 1997 年以来，在主要消费品生产的第二产业中，房地产、汽车、通讯和一些生产高档消费品的高技术产业的增长率和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虽然基本消费品的产量有所增加，但这些产品在出口产品中占有绝大的比重，而出口的增长率则远超过 GDP 的增长率，为 GDP 增长率的 2-3 倍，在进口的消费品中几乎全部是高档的奢侈品。第三产业的增长率也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并且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工资率极高的金融保险、影视广告和娱乐、体育等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工资率极低的劳动服务业，这明显地表现出与收入差距过大所形成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倾向。

可以说，目前中国这种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的倾向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富人经济”，而这种富人经济会导致收入分配和需求、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高，则使消费品的生产向高收入阶层消费的行业转移，这就使这些行业的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从而产生更多的富人，增加的 GDP 会在富人圈里循环。但问题不只是如此，由于高收入阶层所消费的往往是房地产和具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高科技产品，这就使投资大量涌入这些行业并形成更高的资产值，这种高资产值和高工资必然使其它行业的需求和就业逐渐减少，造成结构性失业，同时使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逐渐被排斥在新技术产品的消费之外。目前这种态势在中国经济中的发展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自 1997 年以来，在 GDP 超过 8% 增长率的条件下，不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大大

放慢，农民的收入增长率严重下降和贫困人口增加，而且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和部分再就业的职工收入水平也在下降，这些人有被经济增长“边缘化”的趋势。

这种由有效需求问题导致的严重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处境，提高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率将会使资产值大幅度增加和收入分配继续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如2003-2004年投资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带来的是投资商把增加的银行贷款一股脑地扔向了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从而严重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物价指数的上升也使决策者采取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加以抑制，但是，要保证8%的增长率又必须保证一定的投资增长，谁又能保证这些投资不投向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呢？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1997年后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70年代滞胀中出现的问题和特征是非常相似的，这是不是说明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并不是在稳定增长，而是遇到了严重的滞胀或与滞胀相类似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 一、收入-支出模型与经济波动

现在，我们采用一种新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讨论经济波动问题。首先，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 $C+S=C+I$ ），按照国民收入核算“收入法”的统计，把收入一方改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sup>1</sup>

$$W+d+r+\pi = C+I$$

其中，收入方：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和 $\pi$ 为利润，总支出由消费（C）加投资（I）构成。

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盈利或亏损，这一点是本模型的一个重要特性。这一模型中的收入一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构成。这样，企业的总成本由工资（W）、折旧（d）和利息（r）构成，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时，厂商将获得利润（ $\pi$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即：

$$\pi = (C+I) - (W+d+r)$$

在这一公式中，企业的固定成本 $D+r$ 取决于原有的资产值（K）和折旧率（ $\delta$ ）与利息率（i），即企业的折旧为： $D = \delta K$ ，为了简化，这里先不考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利息为： $r = iK$ ，资产值（K）是由以前的投资所决定的，即： $K = \Sigma I - \Sigma d$ 。可以把上面的公式改为：

$$W + (\delta + i)K + \pi = C + I$$

加入企业以利润为经营目标的假设，这样，企业增加或减少产出和是否扩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即当 $\pi > 0$ 时，企业将扩大产出和投资，而当 $\pi < 0$ 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投资，我们将得到上述模型的均衡状态，即 $\pi = 0$ 。让我们在这一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来讨论稳定状态的条件和经济波动。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 $\Delta Y/Y$ （ $Y = \text{GDP}$ ）不变，资本-产出比率 $K/Y$ 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 $W/D$ 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 $C/I$ 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 $I/K$ 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 $W/r$ 也是不变的，从而 $r/K = i$ 。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

<sup>1</sup> 这种收入法的分类是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所使用的，原来的统计为： $W+d+T+R=\text{GDP}$ ，这里不考虑政府的税收（T），把营业盈余（R）划分为利息（r）和利润（ $\pi$ ）两部分。

这里重要的是投资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联系,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即  $K_t = K_{t-1} + I_t$ ,  $d_t = d_{t-1} + \delta I_{t-1}$ ),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在上述模型  $W + (\delta + i)K + \pi = C + I$  中,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在短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给定的,从而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如果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会出现赢利,即  $\pi > 0$ ,如果假设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利润,则利润的增加会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扩大,而投资的增加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引发更多的投资。但在上述模型中,本期投资的增加将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从而使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增加,因此,要使增加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则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同时,上述保持稳定状态条件的各种比率也将以累积的比率变动,但这种累积的比率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一旦投资的增长率不再能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即  $\pi < 0$ ),从而使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会使利润下降或亏损增加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只要利息率不变,则经济将围绕着由利息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周期性波动。

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在前面讨论的模型中完全采用名义变量而不再考虑价格水平。显然,当考虑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企业是否盈利的只是名义收入流量的变动,因为企业的成本(不仅固定成本,而且包括可变成本的工资率)都是预先给定的,即存在着企业在投资支出时的货币支出或预先的货币契约,主流经济学区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

现在利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讨论有效需求问题,即前面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决定。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  $W / (r + \pi)$  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  $W / (d + r)$  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因此,这种有效需求的条件能否满足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变动和企业成本的变动。

首先来看消费需求的决定。对于消费函数的讨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抛开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即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假设涉及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意味着在长期消费随着总体上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因为这将打破稳定状态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的阶层其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或者说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将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或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可以根据模型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则现实中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在前面模型的收入一方  $(W + d + r + \pi)$  中,不考虑折旧  $D$ ,  $W$  表示工资收入,  $r$  表示利息收入,  $\pi$  表示利润或经营收入。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表述为:  $C = f\{W / (r + \pi)\}$ ,即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

首先来看工资的决定,企业在作投资计划时,必须给定工资,否则就无法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另一方面,由于工资合同的存在,工资也具有刚性。但工资作为“可变成本”是可变的,工资的变化基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状态或失业状态,当经济高涨和企业的利润高时,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但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的上升比例,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但利润可能下降的更多,从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从短期分析来看,为了考察利润的变动,可以把工资视为给定的。

再来看利息的决定。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利息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可以把利息直接联系到资本存量。由于  $r = iK$ ,假设利息率( $i$ )不变,则随着资

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

现在看利润( $\pi$ )的决定。如我们在前面表明的,对于企业的固定成本折旧和利息,给定折旧率和利息率,则在短期分析中,企业的成本可视为给定的,比如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在年初就被给定了,如果假设工资也是给定的,利润将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上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则会使利润下降。一般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衰退阶段则是下降的。

这样,当投资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如上所述,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或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即 $W/(r+\pi)$ 降低,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

现在来看经济高涨时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或折旧与利息的比重下降,或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即 $W/(d+r)$ 下降。加入前面讨论的收入分配的变动,即经济高涨时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 $W/(r+\pi)$ 。这样,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了,而此时如果企业降低价格就会引起亏损。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消费支出下降时,能否通过投资支出的增加来弥补,仅从前面的推论即可否定用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为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在当期增加需求,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当企业的产品积压而不得不降低价格时,企业将根据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行事而力图使其减少亏损,即解雇工人,失业的增加也会使工资率下降,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因此,降低工资并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失业。当然,如果企业提高工资和增加就业将会改善有效需求,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因为这将增加企业的亏损,企业或资本家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当消费品市场萎缩和企业严重亏损时,投资将大幅度下降,即使利息率能够下降,由于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也不会找到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 $W/(d+r)$ 和 $W/(r+\pi)$ 。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给定消费倾向和利息率,这里将有一个唯一的均衡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成本和给定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售出产品或出清市场,换句话说,这一模型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消费倾向和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按货币价值进行的,而与技术完全无关。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 二、中国的经济波动(1990-1997)

现在,我们采用前面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1990年以来的经济波动。这里采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名义变量以与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和收入分配的统计相一致,同时可以表明货币金融体系中各个变量的变动与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这种方法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分析会得出与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完全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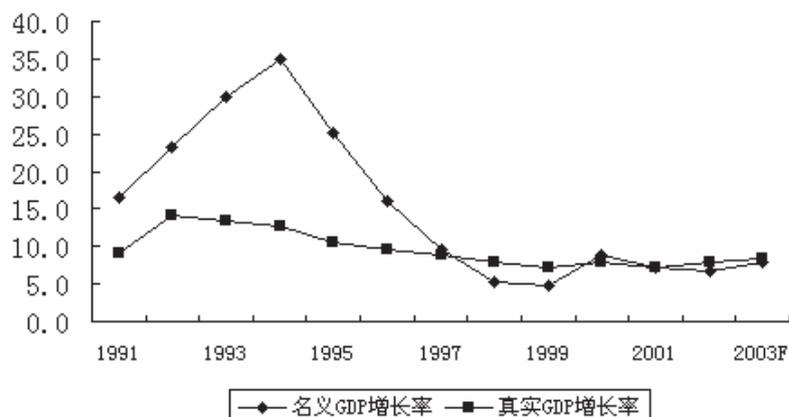


图3 名义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显示了1991年以来中国名义GDP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动，如果按照实际GDP的变动来考察中国的经济波动，可以说是相当平稳的，但按照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来看则表现出巨大的波动，最高点为1994年的35%，最低点为1999年的4.3%。1991-1996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为24%，1997-2001年的平均增长率则低于7%。我们把1996年作为分界点，虽然对于经济周期的分析来讲，自1995年以来经济就处于经济周期下降阶段，1996年企业的利润就接近成本，但自1997年以来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在低位徘徊，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从1997年发生转变，即从1997年前的紧缩政策改为扩张政策，这种划分有利于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

我们来分析1991-1997年的经济波动。

从1991年开始，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攀升，1994年的峰值达到35%，从1991-1996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为24%，自1996年名义增长率开始回落。这种名义增长率的大幅度波动是与投资的大幅度波动直接相关的。图4和图5表示的投资与消费的变动，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波动远小于投资的波动。1991-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为32%，最高的1994年为61.8%，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名义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图6表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动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具有极高的相关性，这说明这一时期的高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带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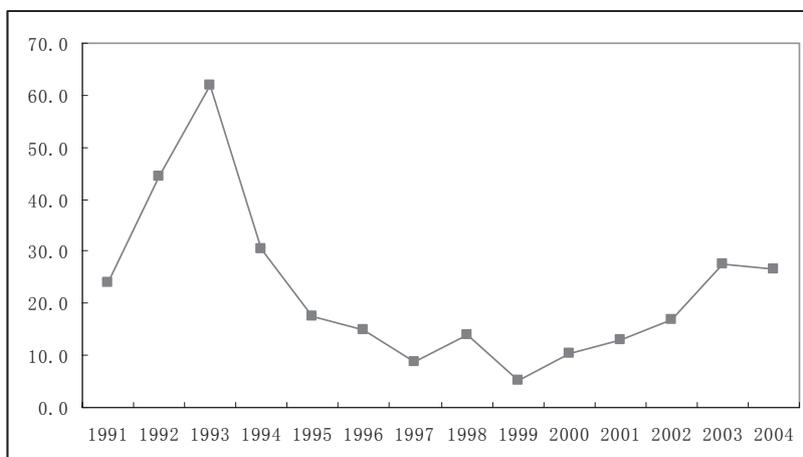


图4 1991-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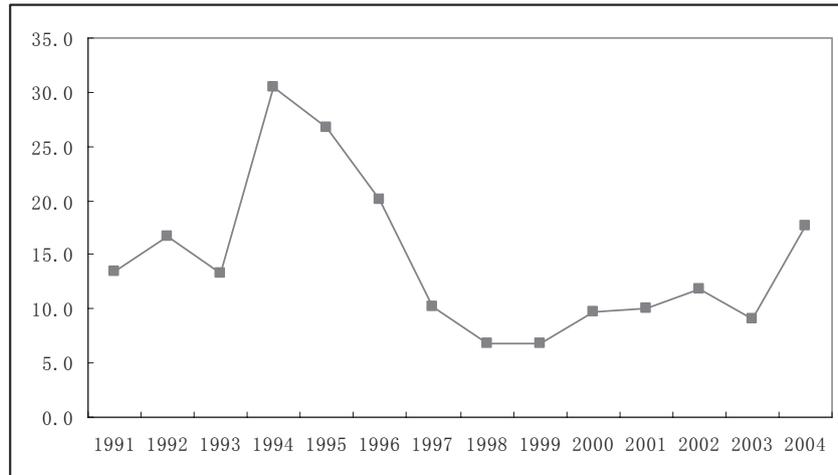


图 5 1991 年-200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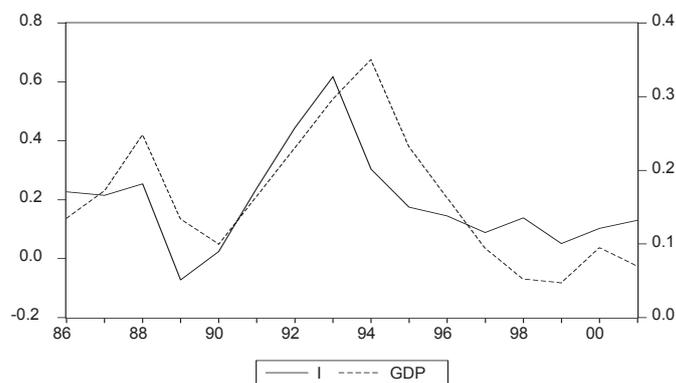


图 6 投资增长率与名 GDP 增长率

按照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投资的增加使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会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当商业银行的贷款不考虑企业的资产抵押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企业的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会“内生”地增加。然而，这种高投资增长率所带来的结果是固定资产（资产值）的增加，从而使企业的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大幅度增加，当投资和名义 GDP 增长率回落时，就会导致企业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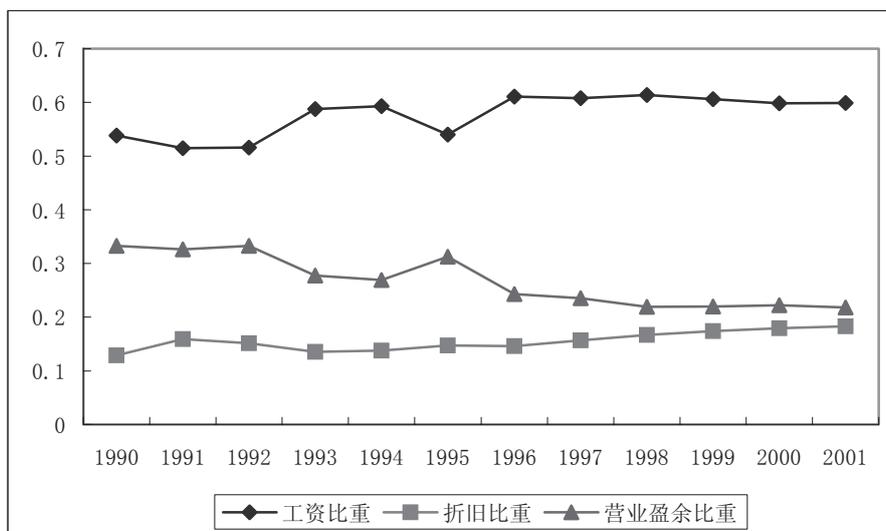


图7 工资、折旧和营业盈余在GDP中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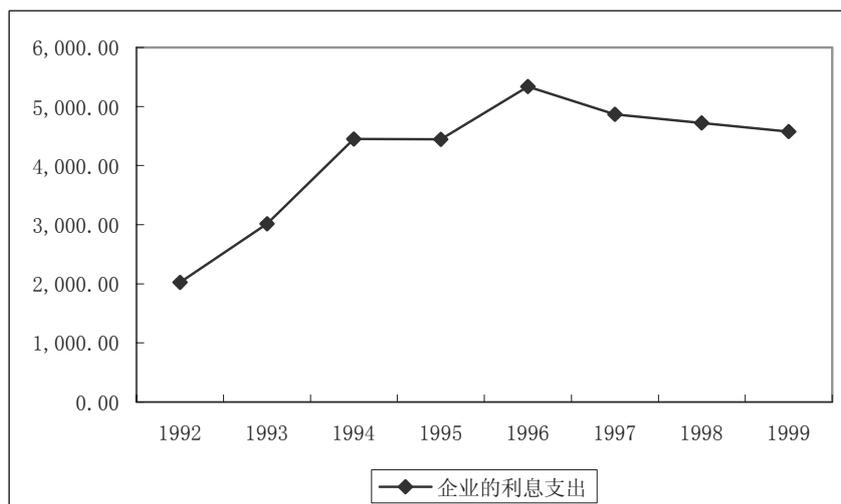


图8 1992-1999年企业利息支出总额

如图7所示，在1990年以来，折旧在GDP中的比重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1990年折旧在GDP中的比重为3.5%，1995年后均超过13%，到1998年已占到GDP的15%。作为企业成本另一项的劳动力报酬，由于工资（以及就业）的刚性，其比重随着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由此导致营业盈余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在经济波动初期的1990年，工资、折旧、营业盈余在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29.57%、19.66%和50.77%，而在2001年这三项的比重分别为24.33%、34.50%和41.17%，工资下降了5.24个百分点，折旧上升了14.84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下降了9.6个百分点。按照前面模型的分析，企业的利润为营业盈余减去利息和税收。如图8所显示的，利息自1992年起大幅度上升，1996年利息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接近营业盈余，从而表明企业几乎没有盈利，加之资产值的上升，企业的净资产税后利润率已经下降到极低的水平。

投资（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与企业利润的变动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图9表示独立核算工业

企业利润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图10表示上市公司总资产收益率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按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在经济高涨阶段，由于有大量资本的投入，企业会获得超额利润，即 $\pi > 0$ ，当期利润的增加与对经济形势预期的看好将导致企业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加大资本的投入，在高利润与高投资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从而出现投资从1991-1994年的快速上升和1994年政府宏观调控后投资增长率的连续大幅度下降。当然，投资的变动不仅取决于利润的变动，而且联系到金融约束，如果我们把商业银行的贷款联系到企业的收益和资产负债率，则可以更好地解释1991-1997年投资的波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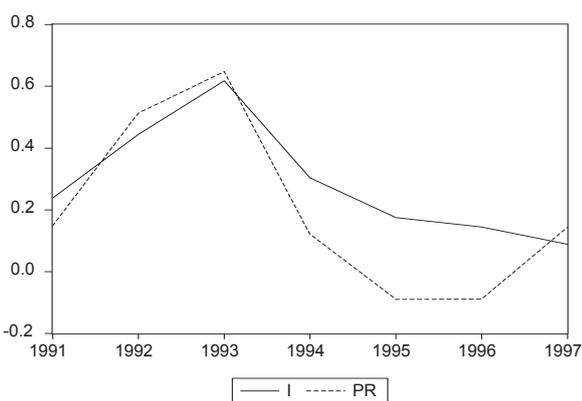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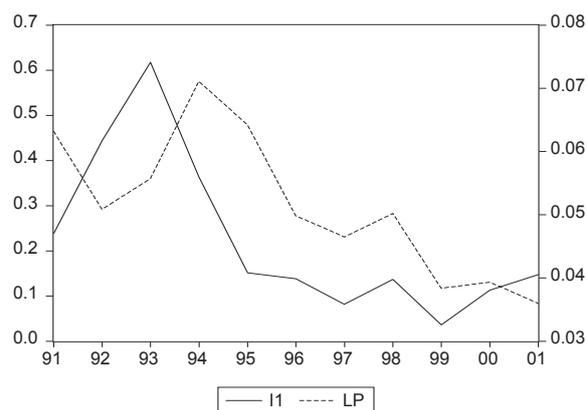


图9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与固定资产投资

图10 上市公司总资产收益率与固定资产投资<sup>2</sup>

企业的投资和利润的变动联系到消费需求的变动，如图5所示，1991-1998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也产生大幅度的波动，虽然波动的幅度小于投资增长率，但在1997和1998年表现出比投资更严重的下降倾向，造成消费品市场的需求不足。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又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在消费品市场全面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已经难以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导致消费品市场萎缩的直接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和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而这些原因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关于消费支出的变动与收入变动的关系目前有许多研究，但这种消费函数的研究对于说明企业利润的变动是有缺陷的，从而不利于表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我们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表明，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对于说明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前面的统计数据，从1991-1994年，投资的增长率与工资总量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在扩大，1994年后由于投资的下降和工资具有一定的刚性，则二者的差距在缩小。在经济的上升阶段，这种资产值的上升使工资在成本中比重下降的含义在于，当投资一旦减少和从资本品转向消费品产生，则工资支出将小于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而导致需求不足。由于这里不再涉及复杂的两个部门模型，只能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来说明这一问题。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成本和收益状况，图11采用企业的数据来表明工资、折旧和利润在企业收入中的比重，这里的利润包括利息与税收。与图7的主要区别是在工资收入中剔除了1997年后国家公务员工资大幅度增长的因素。

<sup>2</sup> 注：上市公司数据根据各年年报整理，见 [www.cninfo.com.cn](http://www.cninfo.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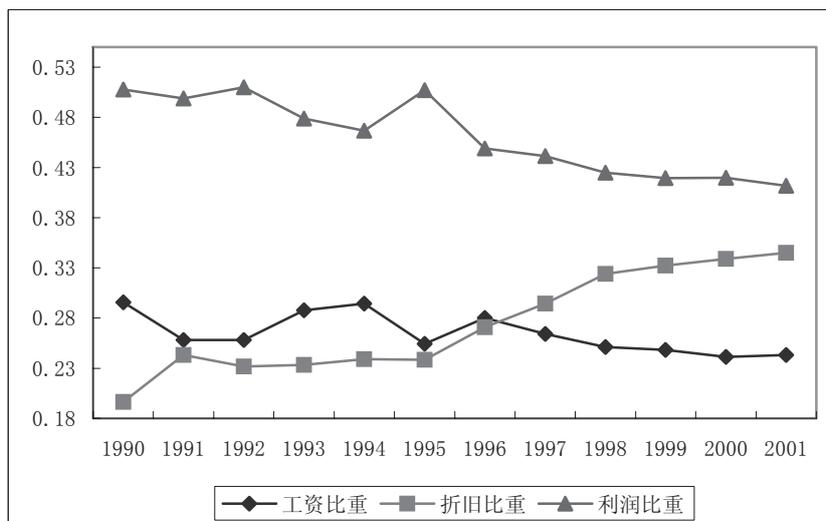


图 11 工资、折旧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 (企业数据)

如图 11 所示，从 1991-2001 年，企业成本中折旧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利润则在下降，工资的比重在 1994 年前是上升的，这与前面所表明的投资增长率快于工资增长率的分析并不矛盾，因为固定资产有一个形成期，如折旧成本是在 1995 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度上升的。从而工资成本与折旧成本的比重在 1996 年后显示出明显的变化，即折旧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工资成本则持续下降。这种工资和折旧成本的变动必然使工人买不起按成本定价的产品。

再来看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按照前面模型的分析，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长导致利润和利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提高，而工资的比重下降，由于工资的消费倾向大于非工资收入，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引致了消费倾向的下降和消费支出的下降。如图 5 中消费的增长率低于投资的增长率可以表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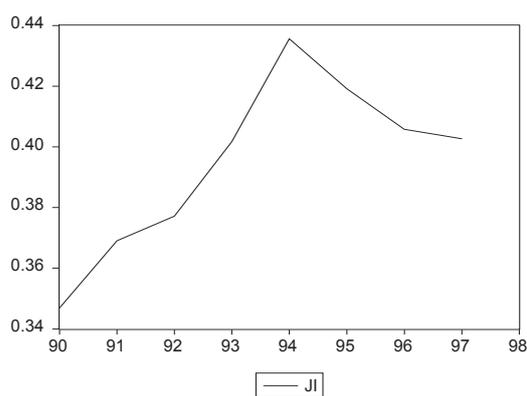


图 12 基尼系数的变动<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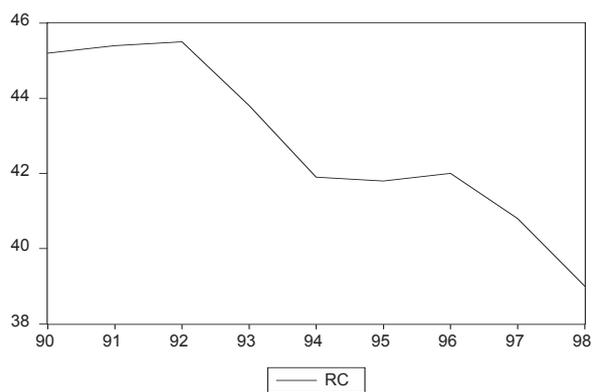


图 13 消费率的变动<sup>4</sup>

<sup>3</sup> 基尼系数的计算引自南开大学周云波未发表的论文，该文中所引的其他基尼系数的计算都表明了这种趋势。

<sup>4</sup> 消费率变动的资料引自赵京兴《消费需求分析》，《中国经济前景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我们采用基尼系数的变化与消费变动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图 12 所显示的基尼系数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在 1994 年达到最高值，1995 年之后由于投资和 GDP 增长率的下降，使财产收入下降，基尼系数也呈下降趋势。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对于解释消费倾向的变动是重要的，如图 13 所显示的，居民消费率在 1993 年开始较大幅度下降联系到基尼系数的上升，而 1997 和 1998 年消费倾向的大幅度下降则主要来自于名义 GDP 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虽然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从 1993 年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在 1996 年名义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如前所述，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资产值过高使工资在产品成本和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同时大幅度下降，由此导致消费支出小于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而造成企业的亏损，企业在亏损状态下又进一步减少投资和降低工资，由此导致投资和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的经济衰退。按照实际 GDP 和物价指数的统计方法，自 1998-2000 年出现通货紧缩，中国通货紧缩的一个特点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比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下降幅度要大，虽然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远大于消费的下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工资在成本和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表现为这些年消费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大低于资本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

投资和名义 GDP 增长率的波动直接联系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图 14 显示，名义 GDP 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 $M_2$ ) 增长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根据图 15 剔除银行体系存贷差的变动，则名义 GDP 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 $M_2$ ) 增长率的相关度更高。因此，我们可以从内生的货币供给角度进一步表明名义 GDP 增长率的波动。在 1991-1994 年的经济上升期，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储蓄增加，从而使按存款统计的货币供应量 ( $M_2$ ) 的增长率以累积的比率上升，由图 15 所表示的 1994 年之前大量负值的存贷差表明商业银行加大了向企业的贷款，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上升。1995 年后，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和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同时政府采取了紧缩性的宏观政策，这使  $M_2$  的增长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大幅度持续下降。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给可以从存贷差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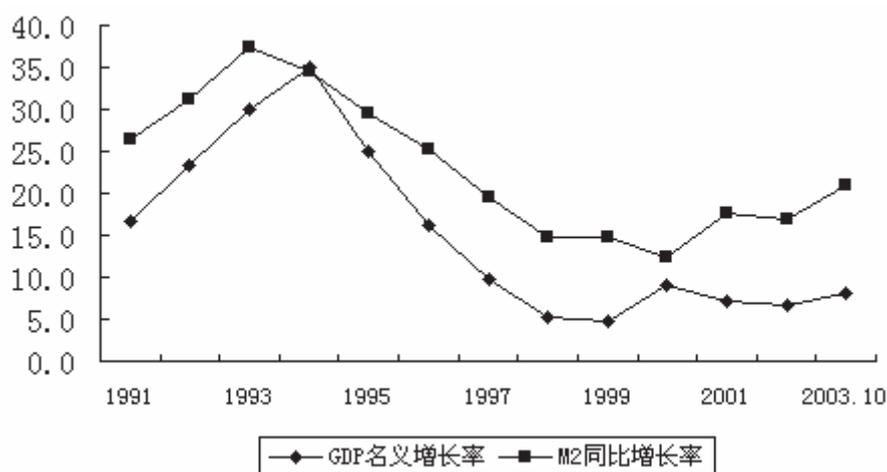


图 14 名义 GDP 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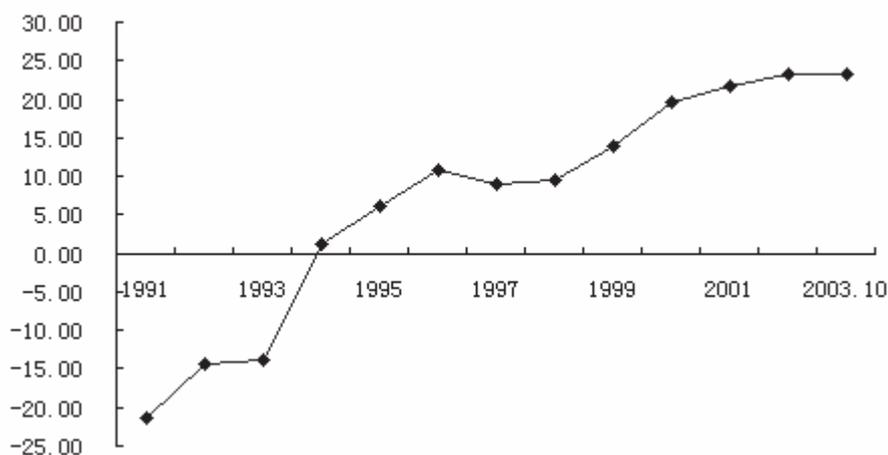


图 15 存贷差的变动

我们还可以从贷款增长率的变动来解释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图 16 是 1990-1999 年的贷款增长率与名义 GDP 增长率的比较。图 16 表明，1990-1999 年贷款增长率的波动要小于 GDP 增长率的波动，在较长的时期内贷款处于 20%-25% 之间，但 1997 年以后急剧直线下降，与名义 GDP 的下降形成鲜明的一致性。1991-1994 年，贷款整体上处于增长的态势，尽管名义 GDP 的增长率远高于贷款增长率，但是可以认为以前的贷款余额使名义 GDP 的调整增长成为现实。1995 年和 1996 年贷款的增长率虽然没有很大的下降，但我们在前面的理论分析时曾表明，当经济增长率以累积的比率上升时，即使贷款的增长率不变，企业的利润也会下降从而使投资下降。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企业利润的大幅度下降乃至亏损，商业银行从 1997 年开始大幅度减少贷款，由此导致了名义 GDP 增长率和投资的进一步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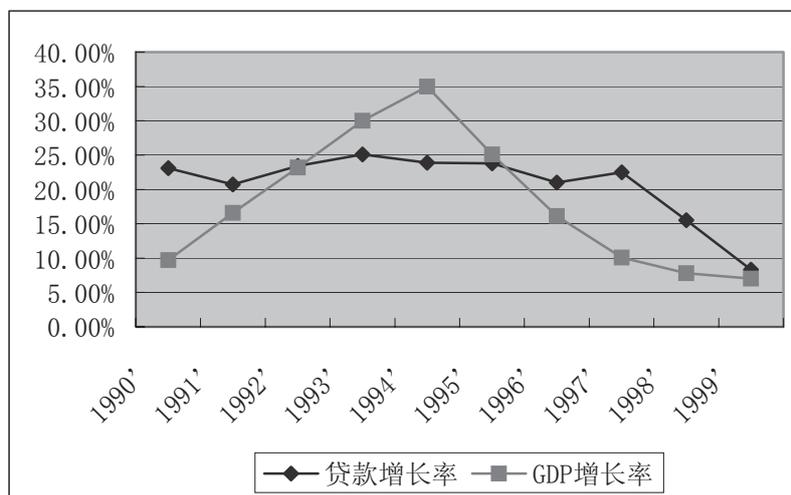


图 16 1990-1999 年贷款和经济增长率

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大幅度提高。1980 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为 18.7%，经过 1985-1988 年的高增长，到 1990 年约为 50%，而 1991 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提高，在 1994 年的最高点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79%，这种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是商业银行减少贷款的重要原因。

### 三、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

自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衰退和调整时期,1999年名义GDP增长率跌落到最低点的4.7%,前面的分析表明,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产生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导致的资产值过高、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下降和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这些问题造成市场需求萎缩和商业银行大幅度缩减信贷。这种经济衰退具有经济周期的一般特征和经济快速货币化过程所产生的严重衰退的典型特征,即这种经济衰退是在市场机制和货币金融体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对经济衰退的调整除了按照一般经济周期的规律降低资产值 and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外,还需要从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和进一步货币化的方向进行调整。

然而,在主流经济学观念的统治下,中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部门对这种经济衰退的性质是不清楚的,人们习惯地按照主流经济学实际变量的方式来考虑所有的统计数据 and 出现的问题。经济学家对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变动的一致看法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在1997年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根据8%的实际GDP增长率认为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通货膨胀终于被遏制住了。实际上,中国自1996年企业的利润就开始大幅度下降,到1997年许多企业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亏损,但经济学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几乎是一致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和生产率不高造成的,并把其归之于高投入、低产出,从而只要控制住投资的增长率即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在1997年除了因为通货膨胀率下降而采用了降低利率的政策外,没有针对经济衰退进行政策调整。直到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实际GDP”增长率下降和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时才开始意识到出现了经济衰退,但对这种经济衰退原因的分析依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把它归之于人们消费倾向发生了变化以及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政策上采取了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及准备金率来扩大总需求。

关于自1998年以来采用的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乃至失去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或者说在目前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水平上讲是必要的,一些政策起到了调整经济周期的作用,如调整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这里需要讨论的是,1998年以来采取的许多政策与经济周期的调整是相背的,而且不利于完善市场机制的运行和经济的进一步货币化。

自1997-2001年,根据各项统计指标,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这5年间名义GDP的增长率为7%,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货币供应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8%,这些数据远低于1980-2001年的平均值。在经济衰退期这些数值的下降是有利于对经济周期的调整的,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可以使资产值下降,商业银行贷款的减少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的亏损和名义GDP增长率的下降也有利于减少富人的财产收入而调节收入分配,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上述数值长达5年间的下降并没有很大地改善导致经济衰退的那些因素,如资产值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过低等问题,有些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国2002-2004年经济开始上升时,上述产生经济周期波动的那些问题立即就变得极为严重,从而不得不在2004年就进行调整。因此,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讨论,以找到使中国经济真正走出低谷的方法。

当我们完全抛弃主流经济学实际变量和生产函数的分析方法,政府财政将成为与企业 and 商业银行共同构成的整个货币流转体系的一部分,与企业 and 商业银行不同,政府财政收支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外生地决定,它可以通过税收和支出改变整个货币流程表,以决定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赢利与亏损并影响其行为,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改变货币供应量和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因此,政府财政和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运行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货

币化过程中，无论是通过货币化建立完整的货币金融体系，还是对经济周期的调整 and 结构调整都是至关重要的。自 1997 年以来，中国针对经济衰退采用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内生的货币流程。

1997 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财政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图 17 反映了 1984 年以来财政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情况，在 1995 年之前，财政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基本上呈平稳下降趋势，从 1984 年的 29.9% 下降为最低点 1995 年的 3.7%。这一比例在 1998 年以后开始有快速提高，1999 年、2000 年、2001 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 13.9%、15%、17.1%。导致这些年财政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提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趋缓，GDP 的绝对数额增长较慢，而税收的征收力度加大，增速远高于 GDP 的增长率。如图 18 所显示的，2000 年、2001 年财政收入的增加比例分别为 17%、22.3%，大大高于同期 GDP 增长率的 9.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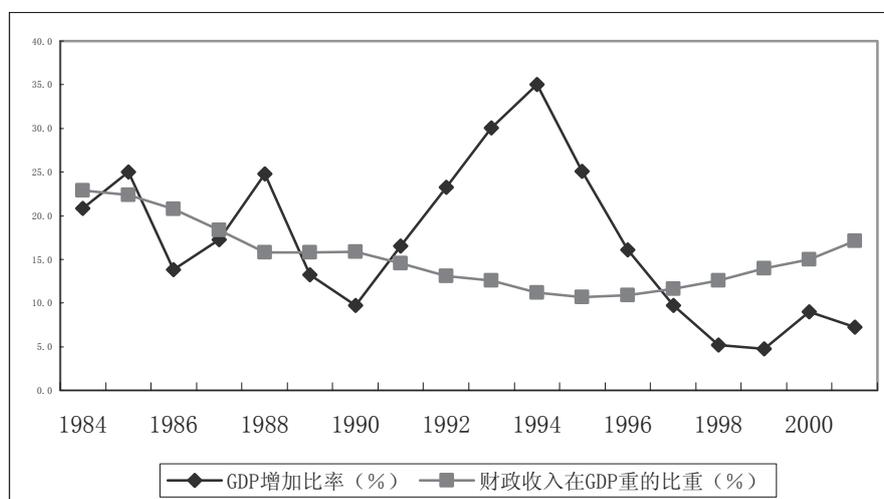


图 17 1984—2001 年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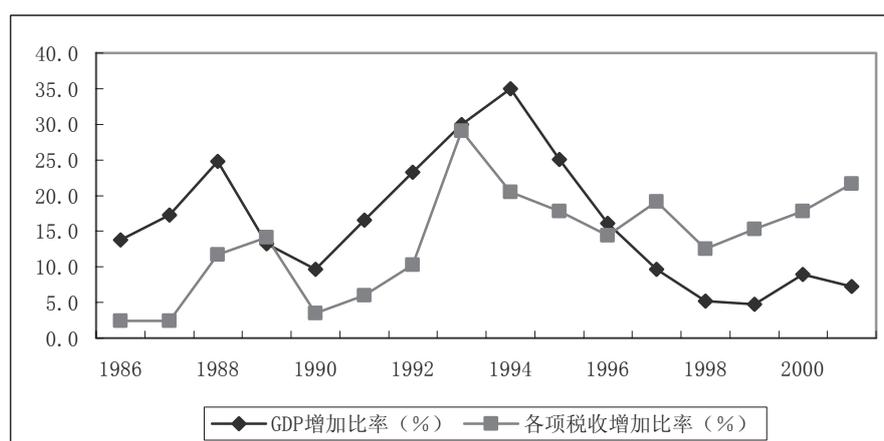


图 18 GDP 增长率与税收的增长率

这种财政收支的变化与商业银行的内生的货币供给形成替代关系。自1997年以来，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亏损大量增加，使商业银行的贷款急剧下降，投资也随之大幅度缩减。从199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建设国债增加政府投资，1998—2000年共发行建设国债3600亿元，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结构调整。政府的财政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可以把财政投资作为企业的风险抵押，但商

业银行由于内生体系中资产结构的失衡，依然不能大幅度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而是产生了惜贷现象，如图15所显示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差）自1998年以后大幅度上升。1997年之前，企业的投资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但在1998—2001年，投资中利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下降到6%，远低于1991—2001年平均水平的22%，与此相对应，利用财政投资的部分大量增加。图19显示了1998年前后预算内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资金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动。

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经累计发行长期国债超过了6000亿元，支撑了财政支出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递增。国内很多学者认为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认为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极大地拉动了需求和GDP的增长率，并使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从亏损转为利润大幅度上升。同时，按照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财政政策原理，只要经济中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则财政支出的增加将带来实际GDP的增长，从而根据1998—2001年的统计资料可以判断，中国自1998年以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成功的，它带动了实际GDP的增长而没有出现西方国家70年代的滞涨，实际上，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也主要是根据8%的实际GDP增长率和是否出现了通货膨胀。

但是，从我们前面所列出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加大财政支出虽然带动了GDP的增长和使企业利润增加，但对于有效需求的改善却是收效甚微，而且由资产价值和工资的比例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图20显示，1998年之后，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企业的资产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大幅度上升，联系到这一阶段整个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可以表明这种资产值的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的财政投资和相应的银行配套贷款被用于基本建设支出，从而加大了资产值。资产值的上升必然使企业的折旧上升而加大企业的成本，企业利润的增加除了财政支出使需求扩大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率降低造成的，图21表示1998年后利率下降后企业利息支付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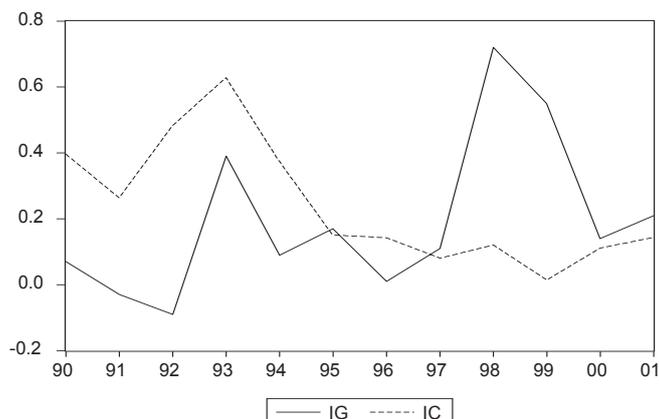


图19 预算内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资金的投资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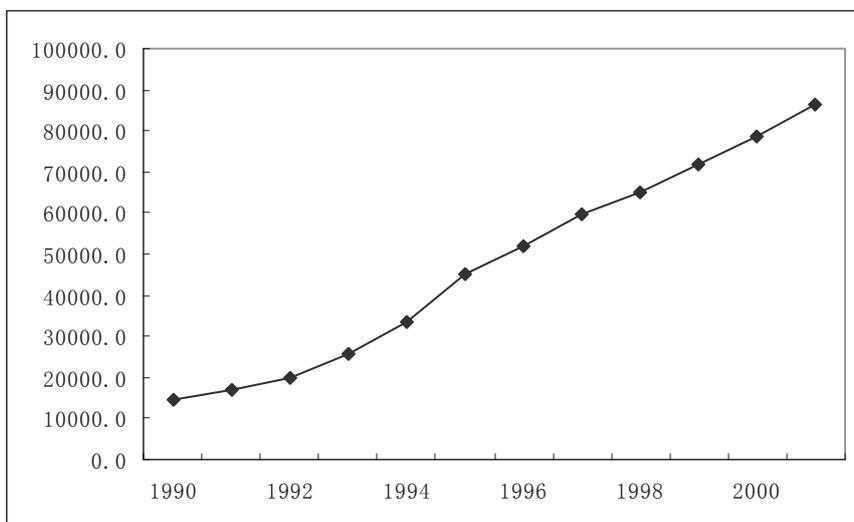


图 20 1990-2001 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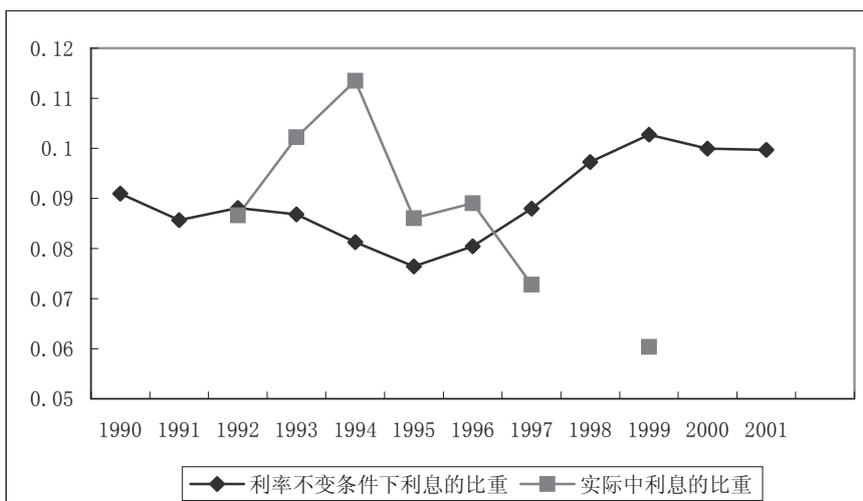


图 21 两种利息在收入中的比重

这种财政投资用于基本建设只会增加资本品的需求，而不是增加日益萎缩的消费品需求。为了刺激消费需求，自 1999 年，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连续 3 年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这对消费需求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政府的财政收支表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表连在一起就会发现，如果财政预算平衡的，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税率，宏观税率从 1998 年的 11% 提高到 2000 年的 14%，当企业的税收成本增加时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在岗职工的工资。如图 11 采用企业数据所测算的，工资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从 1998 年后继续下降，这与折旧成本的上升形成鲜明对照。上述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自 1998 年以来总需求的上升并没有带动消费需求、特别是对基本消费品需求的上升。显然，这种依靠政府支出增加总需求和企业盈利只是在短期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其所带来的资产值上升和企业中工资的下降会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进一步加重。

在主流经济学中，财政支出只是通过调节储蓄和投资的平衡来调节总需求，而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资产结构和内生的货币供给完全不予考虑。我们在前面第七章中讨论滞涨问题时表明，这种按照主流经济学制定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最大危害是对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破坏，美国 30 年代用财政替代银行、70 年代大量发行国债所导致的滞涨和日本 90 年代以来采用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长期停滞，都表明了这种危害的严重性。中国自 1998 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所带来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企业的资产结构和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并没有带来很大的改善，这是中国经济至今不能走出低谷的重要原因。

由于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企业在严重的总需求不足的条件并没有破产，而是使资产值继续大幅度上升，这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商业银行的经营越发艰难，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接近 70% 时，商业银行的贷款几乎是完全没有抵押的，因为企业一旦破产，其拍卖后的收入根本不够安置下岗职工的，商业银行必然会损失全部贷款，在企业利润大幅度下降而面临亏损时，商业银行从自身的风险考虑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惜贷”问题，而银行贷款的下降又使商业银行的坏帐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政府采用扩大总支出的方法虽然可以使企业免于破产，但却无法解决商业银行的“惜贷”问题，这使得财政投资的增加并不能拉动民间投资的增加（如前面图 19 的统计资料所示）。政府财政依靠发行公债扩大总支出对于扩大货币供给必然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如图 22 所示，1990—1997 年间，财政支出与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 1998 年后两者之间呈明显不规则的变动。尤其是从 1997 年到 2000 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而货币供应量则不断下降，受财政支出影响很小，其原因就在于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

从 1998 年起，政府就采取各种政策稳定金融体系和解决商业银行的呆坏帐问题。1998 年财政部发行 2700 亿特别国债，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补充到 8% 以上。1999 年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利用拍卖，追偿，债转股，出售，资产重组等方式共剥离 1.4 万亿不良贷款，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从 1998—2001 年，商业银行的坏帐和不良资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到 2001 年底，按照“一逾二呆”的四级分类办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本外币贷款为 7 万亿人民币，不良贷款为 1.76 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 25.37%，其中约有 6000 多亿将成为实际损失，占全部贷款的 8% 左右。这种不良贷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商业银行的惜贷而导致的贷款增长率下降和名义 GDP 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企业亏损。尽管 1998 年通过国债为商业银行补充了 2700 亿的资本金，同时有 1.4 万亿不良资产被剥离，但到 2001 年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重新下降到 8% 以下。

因此，要解决商业银行的坏帐问题必须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解决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盲目地采用财政政策解救银行可能会使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失灵。例如，目前中国的国债存量对 GDP 的比例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已经对金融体系的运行产生了影响，商业银行自 1998—2001 年存贷差的大幅度上升与国债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大量国债沉积在商业银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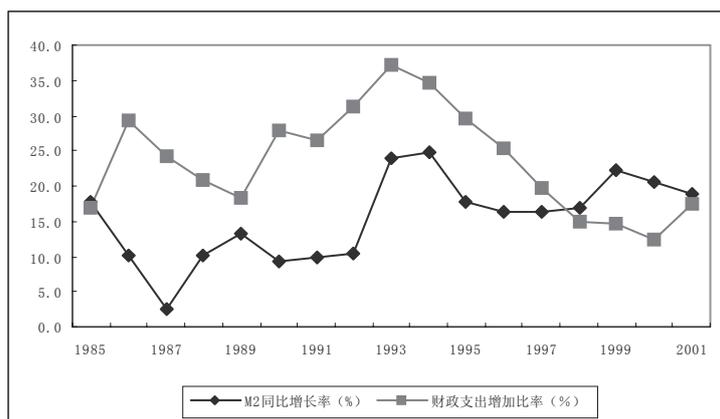


图 22  $M_2$  与财政支出增长比率比较

仅使商业银行得到无风险的收益和抵押，而且一旦经济出现回升的势头，则会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波动。

由上述分析可见，自 1998 年中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到 2001 年虽然防止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并达到了 8% 的稳定的增长率，但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资产值继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产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就业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基础工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如 1998-2001 年，房地产业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 28.7%，比 3.6% 的平均投资增长率高出近 2 倍，虽然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在加快，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合理的资产结构。

在 2002 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条件下，投资和信贷的增长率开始回升，中国的资本市场从 1999 年在政策的引导下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至 2001 年共为企业融资 6000 多亿，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虽然是通过增加资产值达到的。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大力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成立的时间晚和增长的速度快，从而其资产状况要好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加剧了银行业的竞争，也有利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由于 1997-2002 年投资和信贷增长率的下降使折旧在 GDP 中的比重在 2002 年开始下降，名义 GDP 的增长率和企业的利润开始回升。

2003 年和 2004 年，中国经济在统计指标上出现了全面回升的局面，名义 GDP 的增长率在 2004 年超过了 16%，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接近 20%，投资的增长率超过了 25%，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增加，中国经济似乎已经摆脱了衰退的阴影而进入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是，从 2003 年上半年物价水平开始上升，2004 年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 5%。与 1991-1996 年的通货膨胀不同，在基本消费品市场上，除农产品价格上涨外，其它产品依然供大于求，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则大幅度上扬，因为增加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基础工业以及汽车和电讯等新兴产业，在 GDP 和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这就更接近“滞涨”的定义，它反映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严重结构性失衡。在 2004 年第二季度，由于投资增长率超过了 45% 和物价上涨太快，政府采用了强烈的货币紧缩政策来抑制高增长。到 2005 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开始下降，通货膨胀的势头被制止了，名义 GDP 的增长率回复到 10% 左右。但 2003-2004 年的高增长所出现的严重失衡使政策选择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即一旦放弃紧缩政策，就可能出现宏观经济的失控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在经济刚开始复苏时就采用紧缩政策能不能有效地解决当前中国经济中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

#### 四、中国经济中的总量与结构问题

就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总量和结构问题的讨论是不能采用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因为这些问题研究的主流经济学中本来是找不到的，或者说主流经济学的相对价格理论并不能涉及到这些问题，但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却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导致了严重的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从而造成对当前中国经济中所出现问题的严重误解。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这些问题已经是“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如失业、收入分配和三农问题等，这些问题每年政府都作为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断地加大政策力度，但这些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进行这种理论上的争论和重新建立能够研究这些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

与总量关系相比，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问题是更为突出的，失业率上升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下降，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产业结构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农村城市化和三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不能用主流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理论来研究，因为这些问题完全是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无关的有效需求问题。

## 1、经济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首先，我们来讨论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经济增长率政策的制定，在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经济增长率，因此，如何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目标就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对围绕8%的实际GDP增长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提出了质疑，这种8%的增长率已经成为教条在统治着人们的思维，如果你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计划是8%和实际的增长率在8%左右，很可能是猜对了，那么当你问为什么是8%而不是别的数字呢？我相信经济学家并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和经验上的证据，所以提出8%是因为经济学家拿不出其它的数字，或者说其它的增长率数字比8%更难论证，只是如此而已。这个8%的实际GDP增长率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经济学家拿不出任何生产函数的证据，乃至找不到任何一个技术上的统计数据，我们前面所有的理论分析都是针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生产函数和实际变量的，GDP增长率并不取决于任何技术关系，只是联系到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特殊的货币金融体系。

这个8%的增长率与经验是不相符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或经济货币化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15%，拉美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名义GDP增长率都超过10%，有些国家在几年的短期中超过亚洲国家15%的增长率，英国在1800-1825年和美国在19世纪60-70年代的“资本原始积累”或大规模货币化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远超过其稳定状态下3%的增长率。我们前面讨论了中国1980年以来的经济货币化过程，表明保持高速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以及提高技术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同时需要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之后都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也是高速增长过程所带来的，但我们决不当因为这种高速增长会导致经济波动而追求8%的稳定的增长率，因为这种经济波动是完全可以克服的，韩国通过企业和银行的大规模破产目前已经走出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影，在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的城市化条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背景下，这种8%的增长率能否保持经济的稳定。

可以采用“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来说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

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 / 工资率

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量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这种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货币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存在着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目前中国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接近50%，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如表3.1所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按照中国经济学家对8%的经济增长率测算，中国到2020年将使农村人口的比重从目前的60%降低到50%，即在未来的15年中把农村人口的比重降低10%，如果按照目前的就业弹性计算，即使达到这个目标也是困难的。但是，这个目标是不是合理的或可行的呢？

首先，我们借助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来说明这一问题。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的名义GDP增长率为，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从3.94万亿日元增加到148万亿日元，增长了37倍，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也是战后世界上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从7980亿韩元增长到380000亿韩元，增长了47.6倍，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几乎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

长速度使韩国的农业剩余劳力在这 15 年中得以迅速转移，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 1965 年的 58.46% 下降到 1980 年的 34.01%，年均下降 1.73%。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 1966-1980 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 43.44% 下降到 19.50%，15 年下降了近 24 个百分点，名义 GDP 增长率平均高达 17.83%。这些数据表明，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 GDP 的增长正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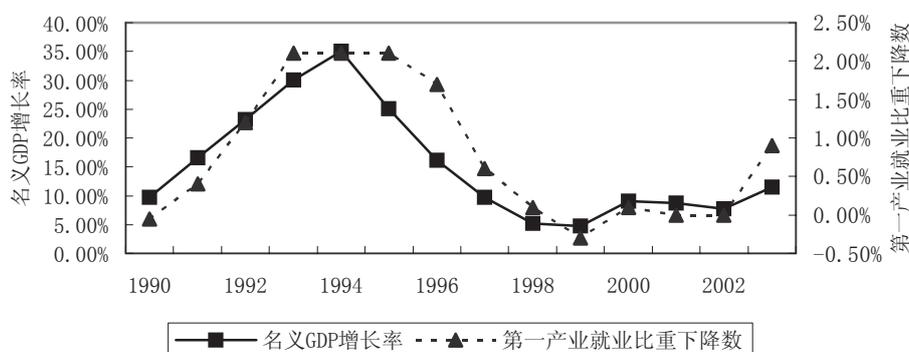


图 23 1990 年—2003 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与名义 GDP 增长率

图 23 是中国 1991-2003 年名义 GDP 增长率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动关系，它也表明了二者的相关性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从 1992 年到 1996 年，这几年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25.88%，在这段时间内农业人口的转移的速度也较快，年均转移劳动力 1428 万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年平均下降 1.84%；而从 1997 年开始，随着名义 GDP 增长率的下降，劳动力转移速度大大减慢。1980 年至今，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每年下降 0.86%，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平均每年下降 1.7% 左右，与中国 1992-1996 年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时期相当。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如果达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每年下降 1.7% 的速度，名义 GDP 增长率必须超过 17%。

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就目前中国所达到的技术水平来讲，对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进一步的货币化来加速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列举上面的数据，一方面表明了名义 GDP 增长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和韩国工业化初期的技术水平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完全可能达到和超过日本和韩国的水平，如达到 1992-1996 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就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来讲，所有的问题都联系到这种二元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通过企业破产使名义 GDP 增长率下降对于医治经济周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在中国目前农村人口依然为 60% 的水平时，名义 GDP 增长率的下降将大大减慢中国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名义 GDP 的增长率直接关系到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其稳定状态，例如，8% 的增长率与 15% 的增长率所要求的货币金融体系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这种 8% 的 GDP 增长率长期维持下去，将对以后恢复高速增长带来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正在建立过程中，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的完善也必须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为目标。

就当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来讲，名义 GDP 的增长率必须提高，因为我们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的速度。如果按照 8% 的增长率测算，到 2020 年中国依然要有 50% 的农村人口，这个结果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计划目标的制定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可以说，这种计划目标的实现比把农村人

口减少到40%更难实现,因为中国经济中目前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太慢。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无论采取怎样的政策,工资率都很难上升,而且不能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增长率的提高只能造成城乡差别的继续扩大,农村人口不可能不涌入城市,这不仅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城市所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只能是劳动服务业,这不仅使中国的产业结构无法调整,而且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怎么可以想象到2020年中国农村还存在几亿过剩的劳动力,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成倍提高的条件下他们还可以在农村安心生活呢?农业生产、农村的教育和医疗问题又怎样解决呢?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只有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提高城市化水平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拉美国家所产生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解决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言,显然,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的增长率比紧缩政策要更容易,它不仅易于调节利益矛盾,而且更有利于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相一致。反过来讲,在8%名义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它留给政策调节的空间太小了。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表明,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完全必要的,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和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状况,可以考虑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15%以上,最好能长期稳定在20%左右,<sup>5</sup>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可以降低到40%,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农村人口达到40%的指标可以缓和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初步完成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

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15%以上是不难做到的,1980-2004年中国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就在15%左右,1980-1996年平均GDP增长率接近20%。中国在2003年GDP增长率开始提高后,2004年就超过了15%。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能不能提高名义GDP增长率,而是这种GDP增长率的提高能不能增加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与总量问题相比,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问题是更为严重的,可以说,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其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就业弹性大幅度下降。按照前面“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当名义GDP增长率不变时,就业量取决于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工资率,而中国自1997年以来,在工资占GDP比重下降的同时,许多行业的工资率却大幅度上升,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由此导致了就业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自1997年经济衰退以来,在名义GDP增长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至2003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呈上升的趋势。重述前面的数字,1997-2003年的7年间,虽然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8%,但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只下降了0.8%,这远低于1992-1996年之间一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2004年中国总体就业弹性仅为0.08按这个弹性计算,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08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600万人。按照这样的就业弹性,即使名义GDP增长率达到15%,将只能吸纳9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只是相当于城镇新增的劳动力人数,这显然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标不相适应。

就业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自1997年以来中国出现的严重的结构问题,即产业结构和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结构,二者相互作用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扭曲。我们来讨论这种结构问题。

<sup>5</sup> 这里所提出的20%的增长率目标主要是考虑能否被人们接受,以及更容易论证,而就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和考虑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名义GDP的增长率是否可以提高到25%呢?

## 2、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紧密联系到有效需求与经济波动，而且直接联系到人们的利益关系，从而涉及到经济乃至政治的稳定问题。自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扩大，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以下上升到1990年的0.3左右，1991-1996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997年基尼系数接近0.4，从1998年至2003年，基尼系数出现了继续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到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这个数字超过了国际上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0.4的警戒线，只是略低于世界最高的拉美国家0.47的水平。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引起各方面的密切关注，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表明导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严重扩大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唯此才能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主流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只是技术上的要素价格理论，与现实市场经济中按照“价值”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完全无关的，它不能用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目前所有采用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的统计分析都带有严重的循环推论，根本不能表明收入分配的决定与变动。<sup>6</sup>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取决于有效需求，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是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自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结构性矛盾使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 (1) 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

图24显示了中国基尼系数的变动，基尼系数从1984年来一直稳步上升，在1990-1994年间大幅度增加，此后在1995-1997年开始从1994年的高点(0.4334)下降，但1998年后又开始大幅度回升，2003年这一指标升至0.458。<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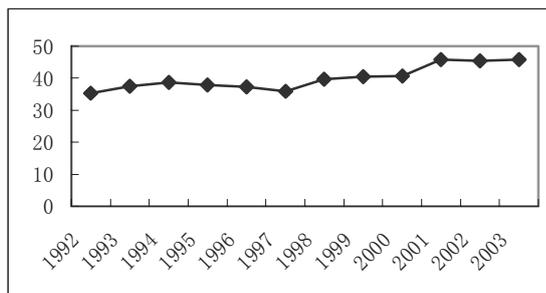


图24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sup>8</sup>

在各种收入来源中，工资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最慢。1991-2003年的十三年间，年均增长最快的是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29.68%，其次是财产性收入20.32%，排在第三位的是转移性收入，18.86%，增长最慢的是工资性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5.47%。2003年，财产性收入增速为32.18%，而同期工资收入的增速仅为11.68%，前者的增长大大快于后者。

这些变化影响了收入分配的格局和财富的集中程度。中国统计局信息网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还有10%的家庭几乎没有财产。从城镇人均资产来看，人均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产份额只有2.75%，而人均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产份额达到51.07%，后者超过前者的18倍。<sup>9</sup>在金融资产方面也存在着向高收

<sup>6</sup> 1989年，谷书堂教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改变原有的按劳分配原则，而采用“按贡献分配”。关于“按贡献分配”是否能与边际生产力论划清界限的问题曾在经济学界引起激烈争论，1995年后随着这个提法逐渐被人们接受而使争论停止了，但问题并没有被澄清。参见谷书堂1989年，苏星1992年，谷书堂和柳欣1993年。

<sup>7</sup> 毕先萍、简新华：《论中国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4期。

<sup>8</sup> 数据来源：1992-2000年数据摘自夏华：“从基尼系数的测算看中国居民收入状况”，载《现代财经》，2003年第5期。2001-2003年的数据从人民网获得。

<sup>9</sup> 据美联储对美国家庭收入调查，近五年来（1997-2001年），美国10%最富有家庭拥有的净资产（扣除债务）增长69%，平均每户资产达到83.6万美圆，而20%最穷的家庭净资产只增加20%，平均每户仅有7900美圆，贫富

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最高的 20% 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55.4%，而最低 20% 的家庭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 1.5%，高低相差 33.1 倍，中国 8.6% 的富户占有 60.47% 的金融资产。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居民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 (2)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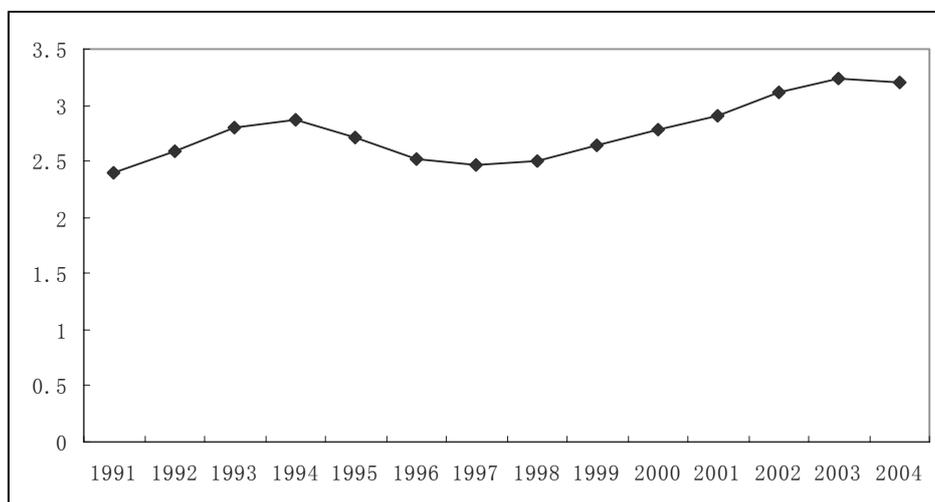


图 25 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动

图 25 表示了 1990 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其收入分配差距从 1990-1994 年逐步扩大，1994 年人均收入比达到了 2.86:1，1995-1997 年间有所好转，下降到 2.5:1 左右，然而这一差距在 1998 年以后直线上升，并超过了以往时期，这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已经超过了 3:1。

### (3) 城镇居民中的收入分配

自 1992 年以来，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严重扩大的趋势。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2 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 0.25，1994 年上升到 0.30，在轻微的下降之后，2002 年又升至 0.32。根据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显示，城镇中 10% 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10% 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两者的比值在 1992 年时是 3.14 倍，1994 年上升到 4.11 倍，2000 年已是 5.02 倍，之后便愈加不可遏制，2003 年达到了 8.43 倍。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于 2002 年 5-7 月对 8 个省市大中小城市的抽样调查，2002 年中国 20% 的高收入户占全部家庭总收入 43.6%，而占 20% 的低收入户仅占全部收入的 6.7%。2003 年中国城镇最高收入户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 8.43 倍。

### (4) 不同行业工资水平的变化

从总体上看，中国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从 1990 年以来存在着扩大的趋势，如图 26 所示。1992 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的行业职工工资相差 1.86 倍，在 2002 年，最高和最低行业的职工工资相差 2.99 倍。从 1990 年到 2002 年，中国农、林、牧、渔业与采掘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慢，只增长了 315.18% 和 305.33%；而房地产业和金融、保险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增长了 591.08% 和 812.49%，后者是前者的 2-2.5 倍。

---

家庭净资产相差 104.5 倍，中国贫富家庭资产相差倍数大于美国达 254.5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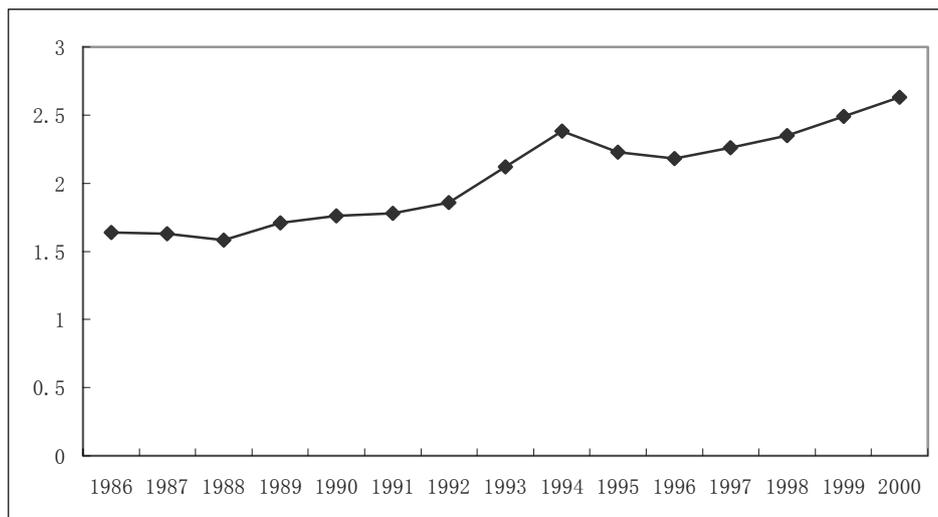


图 26 收入最高行业与收入最低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之比

以上不完整的统计数据基本表明了中国 90 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变动，我们来解释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

### 3、收入分配与经济周期和“滞涨”

在上述数据所显示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中有两个分界点，一个是 1994 年，该年是 1992-1996 年经济波动的最高点，另一个是 1998 年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即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后的变动。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中国的经济波动就是以 1997 年为分界点，讨论了以 1994 年为分界点的 1991-1997 年经济周期波动，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表明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完全是由有效需求所决定的。

前面对有效需求的分析集中在两个关键的比例上，即：（1）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或工资对资产值的比重 ( $W/K$ )，图 11 表示了工资、折旧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图 20 表示了资产值的变动；（2）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用  $W/(r+\pi)$  来表示，它同时表明工资收入和作为财产收入的利息与经营收入的利润之间的比例。我们采用图 27 表示由公式  $W/(r+\pi)$  所表明的收入分配的变动。

从 1991-1994 年的经济上升期，资产值以更大的幅度上升，这使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同时使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1994 年后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到 1997 年，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上升，财产收入则大幅度下降。这样，我们可以解释基尼系数在这个时期中的变动，即基尼系数在 1994 年达到 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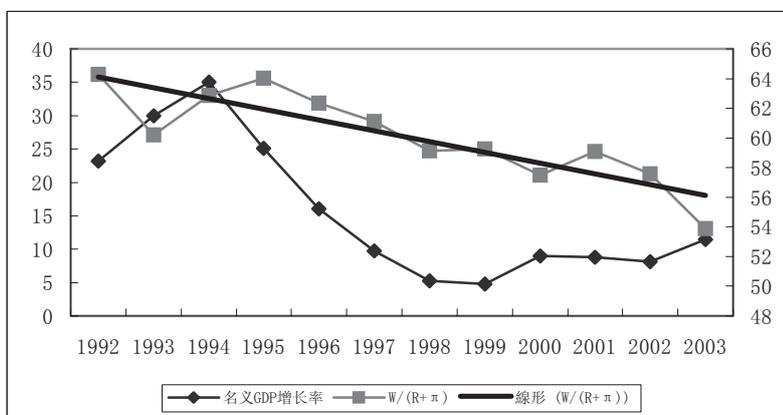


图 27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变动

的最高点，到1997年基尼系数下降到0.36的低点。图27中给出了1992年以来 $W/(R+\pi)$ 的趋势线，总体的趋势线是向下倾斜的，说明 $W/(R+\pi)$ 的值是不断下降的，但在1994-1997年工资的比重是超过趋势线的。

前面对经济周期的分析表明，在1997年中国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资产值，同时使利息和利润收入大幅度下降，工资收入则由于存在着向下的刚性而不会下降，虽然会出现失业，但随着经济复苏就可以使 $W/(R+\pi)$ 的值上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是，自1998年政府采用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支出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不仅企业没有破产，而且出现了资产值继续大幅度上升的局面，如图20所示，从1998年开始资产值大幅度上升，由此导致了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如图27所示，其中2000-2002年工资收入超过趋势线是由于政府为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造成的，如果采用图11中企业的工资计算，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自1998年以来一直是下降的。这样，我们可以解释前面收入分配的数据为什么从1998年以来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国民收入流量的分配，而且由房地产投资所带来的资产值的大幅度增加和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大幅度增加被集中在一部分人手中，基尼系数在1998-2003年的6年中上升了10个点而达到0.458。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扩大产生于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的严重“滞涨”，是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直接联系的。

让我们举两个更直观的例子来说明1998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自1998年起至今，国有企业顺利地完成了“战略性”转移，基本退出了竞争性的基本消费品部门，转向了由政府财政投资支持的垄断性基础产业部门和高档消费品部门，但是，占国有企业1/3以上的下岗职工却被转移到城市中收入最低的劳动服务业部门，这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扩大。另一个例子是房地产业的发展，自1998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率以高于平均投资增长率2倍以上的速度发展，地产值和房价成倍上升，但住房的建筑成本则几乎没有增加，建筑业的工资水平是除农业和劳动服务业外最低的，而且许多农民工的低工资没有计算在内，这种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这种房地产业的发展显然是在政府扩大总支出政策和商业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才得以发展的，换个角度讲，在1994-1997年的宏观政策下，房地产价格一直是下降的，从而如果没有1998年后的财政货币政策，房地产的价格势必继续大幅度下降。

#### 4、收入分配与消费

收入分配是与有效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即收入分配的变动影响消费需求，从而对有效需求构成影响。我们在前面表明了1991-1997年收入分配的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从图28中可以表明1998年以后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关系。1998年以来，随着基尼系数的上升，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这里需要解释的是1999-2001年消费支出的上升与政府为公务员大幅度提高工资有关，即使如此，在2000年以后这种趋势尤为明显，这使从1997年已经产生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图29显示了2003年中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均消费倾向，表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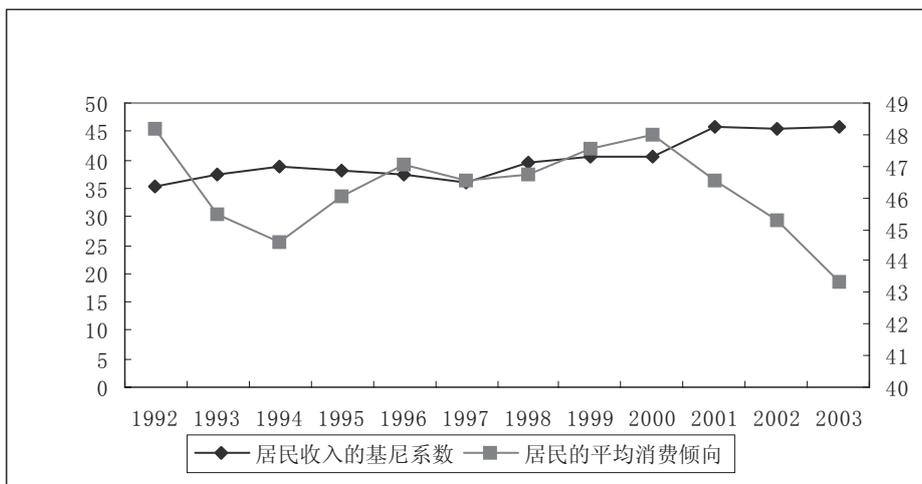


图 28 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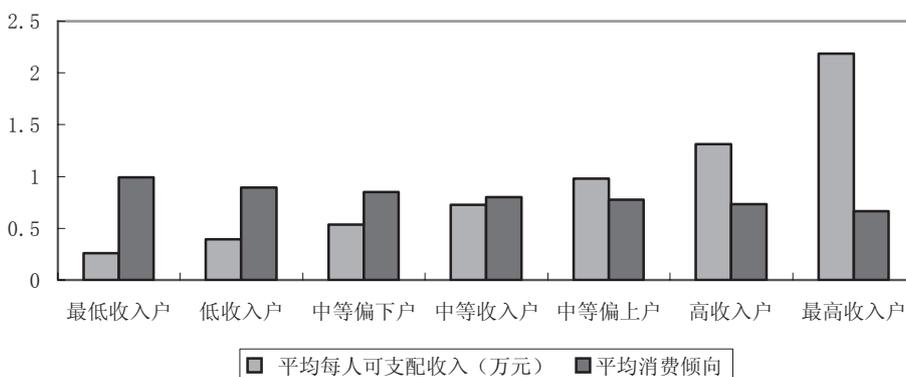


图 29 2003 年中国各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平均消费倾向

由于 1998 年后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导致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2000 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 48.01%，接下来的三年中，消费倾向分别为 46.55%，45.30%和 43.35%，这导致了消费需求的大幅度下降。1998 年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低于 60%，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速一直低于 GDP 增速。2001-2003 年，居民消费的增速分别为 7.0%，6.5%和 7.7%，分别比名义 GDP 增长率低 3.4、2.9 和 4.8 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投资增速分别为 15.26%，12.93%和 21.46%。近年来，GDP 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投资，而投资的增加会不断地提高资产值，投资与消费增长率差距的拉大带来的资产值上升，将会使得有效需求问题更为严重，因为企业资产值的攀升会提高折旧和利息成本，这使企业的赢利变得更为艰难，要获得利润，下一期的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进行，同时使利息和利润收入的增加超过工资收入，收入分配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在总体消费支出增长率下降的同时，高收入阶层在消费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 2003 年占总人口 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 4.7%，而占总人口 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 50%。这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布必然使高档消费品部门的需求旺盛，导致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严重萎缩。

近年来，别墅、高档公寓成为拉动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动力，经济适用房增速则逐渐下降。从 1999 年—2002 年，中国房地产业经营总收入增长了 2.34 倍，而且房地产业中发展最快的又是别墅、高档

公寓，4年间，别墅、高档公寓的投资分别增长了1.89倍和2.83倍，2003年，办公楼和别墅、高档公寓投资完成额分别增长了33.4%和22.4%，而经济适用房只增长了6%，2004年1-10月，全国住宅投资完成额增长27.9%，其中办公楼增长33.8%，经济适用房则仅增长了5%。这种房地产业投资分布的不均衡体现了当前房地产投资是以高收入阶层为消费对象的，造成大量资金集中到只有高收入者才能消费得起的别墅和高档公寓。从1998年-2002年，中国汽车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3.56%上升到5.52%，而且汽车工业中发展最快的又是轿车，2003年中国汽车的产量增长了43%。<sup>10</sup>

另一方面，在低收入阶层连基本的生活消费品都得不到满足的同时，基本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却不断萎缩，甚至是大幅萎缩。2001年中国农村平均每百户家庭只拥有洗衣机29.24台、电冰箱13.59台、收录机20.79台，城镇平均每百户最低收入户家庭也仅拥有洗衣机79.21台、电冰箱63.11台、录音机39.95台；2002年中国农村平均每百户家庭只拥有电视机60.45台、空调2.29台，城镇平均每百户最低收入户家庭也仅拥有空调51.10台，说明这些基本消费品市场尚未达到饱和。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其生产的萎缩，2000年中国洗衣机制造业、电冰箱制造业和收音机、录音机制造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0.146%、0.571%和0.204%，而2001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至0.121%、0.569%和0.173%；2001年中国电视机制造业和空调制造业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0.794%和0.911%，而2002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至0.707%和0.688%。而且这种生产萎缩不仅表现在所占比重的变动上，甚至还表现在产值绝对数的变动上，2001年中国洗衣机制造业和电冰箱制造业的产值比2000年分别下降了12.27亿元和14.58亿元；2002年中国电视机制造业和空调制造业的产值比2001年分别下降了163.34亿元和28.73亿元。<sup>11</sup>而且目前这些家电行业都在向高档产品全面转产。

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扩大所导致的消费结构变动反过来又会影响收入分配，使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萎缩和增长率下降必然使这个部门的工资水平下降，造成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产品滞销、积压，并导致一些企业停产或半停产而增加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工资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又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进一步下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在高收入阶层财富和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收入加速数”现象，他们从他们自己的投资和消费增长中获得利润和更高的收入，因为他们投资和消费的部门就是他们就业的部门，如房地产、汽车和电讯等高档消费品行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告、影视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然后在下一期继续扩大投资和消费，从而能够得到更高的收入，形成产业和收入在高收入阶层之间循环。由于高收入阶层占有绝大部分财产和金融资产，上述两种循环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目前高收入阶层集中了大部分的金融资产，具备很高的投资能力，但是他们的投资方向几乎没有工业部门，而是房地产和金融投资。<sup>12</sup>

目前中国高收入阶层的“炫耀性”消费表现得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则是低收入水平群体相对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下降，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只限于在精英阶层中分享，而大多数人却无法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时，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如近年来出现的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表明在房价恶性攀升的条件下建筑商竟然支付不起农民工微薄的工资，实际上，在许多基本消费品行业和服务业都存在严重压低工资问题以及降低劳动保护标准问题，特别是失业增加带来的收入下降，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sup>10</sup> 资料来源：《汽车工业年鉴》（2000，2002）

<sup>11</sup> 洗衣机、电冰箱、收录机、空调产值数据来自于《中国机械工业年鉴》（2001、2002）；收录机、电视机产值数据来源于《电子信息产业统计汇编（1992-2000）》和《电子信息产业年报》（2001）。

<sup>12</sup> 调查结果显示：在有投资能力的高收入家庭中，选择股票的次数占总的投资次数的33.07%；商业和服务业占20.42%；国库券占10.63%，其它为银行存款。

## 5、产业结构与就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依赖于需求结构的变动，需求结构则取决于收入分配，而反过来，收入分配又取决于产业结构的变动，由此形成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的循环。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在产业结构分析中按照五个部门划分的方法，正是要使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与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相对应，如上面对收入分配的讨论正是直接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在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接近 60% 的条件下，工业化的目标显然没有完成，正常的产业发展应当是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生产资料部门和基本消费品部门转移，但目前中国出现的状况却是高档消费品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严重萎缩，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自 1997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是高档消费品部门，其次是生产资料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增长率最低，而且就业人数从 1997-2003 年只下降 0.8 个百分点，基本消费品部门虽然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到进出口就完全不同了，目前中国出口占 GDP 的比重已经接近 50%，而且自 2000 年以来的增长率远高于名义 GDP 增长率，由于出口产品主要来自于基本消费品部门，因此，基本消费品部门实际上是严重萎缩的。另一方面，进口的消费品中都属于高档消费品，这使实际的高档消费品部门所占的比重更大。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前面所表述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动是一致的，即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使高档消费品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快速增长。

这种结构变动与就业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其高速增长必然使就业弹性下降，由于高档消费品部门同时具有高工资，其增长率的提高显然会使就业进一步减少。劳动服务业部门是近年来吸收就业最多的部门，但却是城市中工资率最低的部门，在其它部门工资率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增加必然使工资在 GDP 中的比重下降，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更为严重。

表 1 中国 1992-2003 年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相对偏差<sup>13</sup>

年份	三次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			相对偏差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1992	21.8	43.9	34.3	58.5	21.7	19.8	62.7	50.6	42.3
1993	19.9	47.4	32.7	56.4	22.4	21.2	64.7	52.7	35.2
1994	20.2	47.9	31.9	54.3	22.7	23.0	62.8	52.6	27.9
1995	20.5	48.8	30.7	52.2	23.0	24.8	60.7	52.9	19.2
1996	20.4	49.5	30.1	50.5	23.5	26.0	59.6	52.5	13.6
1997	19.1	50.0	30.9	49.9	23.7	26.4	61.7	52.6	14.6
1998	18.6	49.3	32.1	49.8	23.5	26.7	62.7	52.3	16.8
1999	17.6	49.4	33.0	50.1	23.0	26.9	64.9	53.4	18.5
2000	16.4	50.2	33.4	50.0	22.5	27.5	67.2	55.2	17.7
2001	15.8	50.1	34.1	50.0	22.3	27.7	68.4	55.5	18.8
2002	15.3	50.4	34.3	50.0	21.4	28.6	69.4	57.5	16.6
2003	14.6	52.2	33.2	49.1	21.6	29.3	70.3	58.6	11.7

<sup>13</sup> 相对偏差则利用公式 (大值-小值)/大值\*100 计算而来，如第一产业为 (就业-产值)/就业\*100，而二、三产业为 (产值-就业)/产值\*100。

表1是中国1992-2003年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及相对偏差,相对偏差用于表示产值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如果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相当,则相对偏差就小,相对偏差越大意味着就业所能增加的产值越少。

从表1所显示的中国1992-2003年产业结构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58.5%下降为2003年为49.1%,12年间共下降了9.4个百分点,但从1997-2003年却只下降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于第三产业人员数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比却日渐攀升,从1992年的19.8%,上升到2003年的29.3%,上升了9.5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下降的百分比与第三产业上升的百分比大体相当,说明就业变动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总体上比较稳定,但是以1997年为界,1997年前是上升的,而1997年后是下降的。

从产值与就业的对比看,2003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9.1%,而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却仅为14.6%,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力的人均产值是非常低的,这一点可以从表3.1中的相对偏差值过高上反映出来。从1992-2003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43.9%上升到52.2%,12年上升了8.3个百分点,但从1997-2003的8年中仅上升2.2个百分点,而且1997-2003年就业的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相对偏差则从1992年的50.6增加到2003年的58.6。第一、二产业相对偏差在这十几年来均出现了扩大的趋势,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背离。

根据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考虑把中国经济划分为五个部门:(1)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农业部门”;(2)以基础工业为代表的“生产资料部门”,这个部门的特征是“资本密集型”的;(3)以生产基本消费品为基础的“基本消费品部门”,它与生产资料部门相比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或是“劳动密集型”的;(4)生产奢侈品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它包括房地产和一些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劳动服务业外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和影视业等,其特点是“资本密集型”和同时具有高工资的行业;(5)“劳动服务业部门”,即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其特点是具有更低的“资本劳动比率”和更低的工资率。在上述五个部门的划分中,农业部门与目前统计中的第一产业基本是一致的;劳动服务业部门可以比较容易地从第三产业中划分出来;生产资料部门是第二产业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行业来划分;基本消费品部门和高档消费品部门的划分涉及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重合,需要根据行业的特点重新组合。上述部门的划分主要是从投资和收入支出流向、就业等方面考虑的,它能够更好地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比如,目前第三产业中具有最高工资的金融保险业与工资最低的服务业混在一起,这不利于说明收入分配和就业问题。

在上述五个部门模型中,采用货币的流入(投资和消费)决定需求,加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供给,再采用“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决定就业,我们可以得到部门的货币投入产出表,以决定各个部门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加入前面所阐述的总量关系,即按照有效需求的分析加入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来讨论各个宏观变量的相互决定,从而可以从有效需求的角度讨论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举例说明这种方法。

例如讨论农民收入的决定问题,我们可以根据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决定经济中的农产品消费支出,再根据农业生产货币成本的变动决定供给,则可以得到农民的收入水平。那么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呢?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只要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转移,则可以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因为转移出去的农村人口会用从工业部门得到的收入购买农产品,或者说会有增加的货币流入农业,由此可以得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是决定农民收入水平变动的重要因素。

再举劳动服务业的例子,根据消费调查,收入越高的家庭用在劳务上的支出越多,给定总收入,则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对劳务的需求越高,这样,劳动服务业的发展和吸收的就业取决于收入分配的

差距,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增加只能来自于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减少或工资率下降和失业,因此,劳动服务业虽然是最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但发展劳动服务业从总体上并不能增加就业。为了与五个部门的结构相对应,我们采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划分方法把第二产业分成两部分。1998年以来,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平均在60%以上,2003和2004年,重工业增长率分别达到36.12%和35.73%,由于房地产、建筑业和汽车工业包括在重工业中,因此,重工业中实际上包含着一部分高档消费品部门的行业。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与我们前面定义五个部门中的基本消费品部门是大致对应的,只要把目前定义的高科技行业从轻工业中分离出来就可以了。目前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40%左右,且发展相对较慢,发展最快的2003和2004年,增长率仅为16.47%和24.07%。基本消费品部门(轻工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劳动力较多。基本消费品部门比重的下降意味着就业的减少,这可以解释自1997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高科技产业是中国1997年以来发展最快的产业,增长率远高于其它产业,其特点是资本密集型和高工资率,吸收的就业量却很少,我们把高科技产业划分到高档消费品部门。

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变化基本上等于第一产业相反方向的变动,它表明自1992年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是从农业部门转向了第三产业。但我们不能把第三产业作为一个部门来分析,因为第三产业中的劳动服务业的工资率是除农业外最低的,而就业人数却占第三产业的绝大比重。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广告业和邮电通信业的工资率在中国都是最高的,而这些行业就业人数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很低,从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来看,1997-2002年这些行业产值的增长率却极高。因此,需要把第三产业中的劳动服务业分离出来,除劳动服务业外的部分归类于高档消费品部门。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统计数据重新解释,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除劳动服务业外的高档消费品部门,而就业的增加则主要是劳动服务业部门,特别是1997年之后,劳动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在所有5个部门中是最快的。当我们把劳动服务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就会发现,虽然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高,但劳动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却很高,如果考虑到劳动服务业全部集中在城市,即只是为40%的城市人口服务的,则这个比重就太高了。

采用上述五个部门的分类和大致与其对应的统计数据,可以与前面的收入分配变动的分析直接联系起来。自1998年以来,政府财政投资的带动使生产资料部门的比重上升,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导致了高档消费品部门的急剧发展,同时,高收入阶层消费的增加带动了劳动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而基本消费品部门则在萎缩。反过来,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动又可以解释收入分配的变动,占就业量80%以上的农业部门、劳动服务业部门和基本消费品部门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人均产值远远低于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这种严重的结构失衡产生于1998年以来的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资产值越来越高,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而且这种恶性循环近年来急剧加速。

从上述对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中,可以更好地解释就业弹性的下降。一方面,就业弹性的下降产生于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这是因为1998年以来资本密集型的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工资总量下降的同时,快速增长的高档消费品部门的工资率急剧上升,能够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基本消费品部门持续萎缩。劳动服务业部门实际上起到了接收失业职工的作用,否则失业率会大幅度上升,但是,劳动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增长是以工资总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同时,劳动服务业中为高收入阶层服务部分的发展必须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为前提,因此,劳动服务业就业的增加在长期将会进一步增加失业,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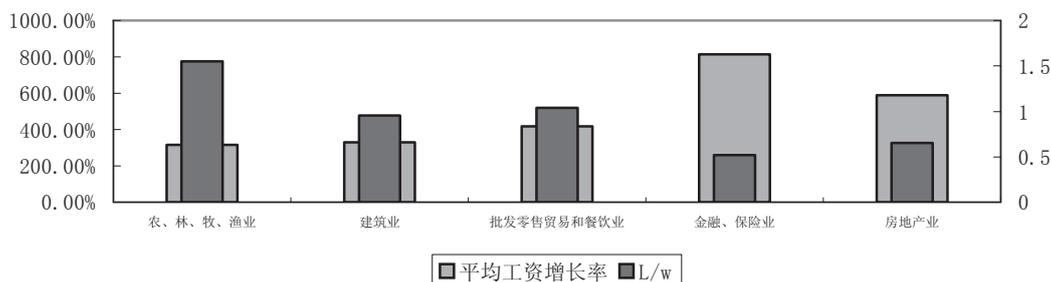


图 30 中国部分行业的 1990-2002 年平均工资增长率及 2002 年劳动力—工资比

图 30 显示出中国 1990-2002 年部分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与 2002 年劳动力—工资比，表明占就业量高的行业工资的增长率远慢于就业量低的行业。同时，工资率上涨不均衡还导致各行业劳动力—工资比差距拉大。我们用某一行业的就业人数除以该行业工资总额来表示该行业的劳动力—工资比，其值反映的是支付一定的工资所能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从图 30 中可以看到，中国近年来工资率相对较低且增长较慢的行业所能解决的就业人数要远远多于工资率相对较高且增长较快的行业。同时，工资率相对较低且增长较慢的行业往往是基本消费品部门，而工资率相对较高且增长较快的行业则是高档消费品部门。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目前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扩大基本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这就需把生产资料部门过高的资产值减下来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高档消费品部门当然是应该发展的部门，但目前必须使其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和工资率下降，使其逐渐变成基本消费品部门。劳动服务业部门的发展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决不能因为它能够增加就业就作为发展的方向。

然而，上述产业结构的调整恰恰是与市场需求的方向完全相背的，由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巨大的惯性，这正是当前中国结构失衡中的最严重问题。这种严重的结构问题也使当前的经济政策面临着严重的两难选择，提高名义 GDP 增长率可能只会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更为恶化，却不会增加就业。2004 年中国名义 GDP 增长率达到了 15%，但带来的却是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 GDP 增长率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反而上升了。2005 年通过紧缩政策使 GDP 增长率回落到 10% 左右，但从各个部门增长率的变动看，增长最快的依然是高档消费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这显然会进一步降低就业增长率。我们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 五、高速增长与经济政策

我们前面的分析完全排除了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的方法，从一种货币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核心是有效需求问题。自 1997 年经济衰退以来，中国经济至今并没有彻底摆脱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而且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使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过程处于停滞状态，货币金融体系和对外贸易也存在着严重的扭曲，这使中国难以步入稳定的高速增长轨道。对于上述问题，在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并不是难以解决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国家对经济保持着强有力控制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来启动另一次的高速增长，只要把握住方向，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调整 and 解决目前存在

的问题。现在，我们把前面分析的要点进行归纳，以形成一个能够进行讨论的“高速增长方案”。

前面对总量与结构的分析所要表明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产生于中国经济货币化过程中高增长后的经济衰退。1997年以来的经济衰退具有一般经济周期的特征，即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所产生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重下降，同时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使商业银行紧缩信贷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1997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缓解上述矛盾，而是使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这突出地表现在由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产生的不合理的需求导向与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在城镇失业率提高的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大幅度下降。上述问题已经具有了“滞涨”的典型特征。对于这种经济衰退和“滞涨”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是通过企业破产降低资产值并同时改变收入分配。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这种通过企业和银行破产以及重组金融的方法是医治经济衰退和“滞涨”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经验中总是失败的呢？原因就在于各国政府所采用的“逆经济周期”而行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完全是与调节有效需求的方向相反的，即导致了更高的资产值和更低的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同时，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挽救银行不破产而不是重组金融，这些只能使上述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比例关系进一步恶化。自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资产值上升、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总需求扩张政策阻碍了市场机制通过使企业破产的自动调节，显然，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在企业70%资产负债率的条件下继续增加货币供给，企业和商业银行也不可能不破产，而政府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实际上只是起到了防止企业破产的作用，而不能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比例关系，这使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必然导致上述恶性循环的“滞涨”。

但是，通过紧缩政策而使企业、银行破产和重组金融的方法在中国现阶段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行的，这正是我们强调中国特殊的货币化过程中的经济衰退与一般的经济周期不同的原因。其一，如我们前面对各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验分析所表明的，这种货币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衰退往往具有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性质，如英国1825年的经济危机和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sup>14</sup>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条件下，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否使经济恢复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进入复苏阶段也是有疑问的。其二，中国1997年的经济衰退是在尚未完成农村的城市化和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条件下发生的，依靠紧缩政策进行调整必然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对于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也是极端不利的。就当前保证8%的增长率来讲，这已经严重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的货币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通过扩张总需求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走出“滞涨”，具体讲，就是按照“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所表明的名义GDP增长率和就业的关系，根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要求并参考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通过总量的扩张来调整结构，在高增长过程中改变那些不合理的比例关系，使经济走向高速增长的稳定状态。这种“扩张性政策”的要点是，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手段在扩张总量的同时改变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方向，即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的恶性循环。可以说，这种依靠经济扩张来医治衰退和滞涨的方式在世界各国是没有先例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由于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农村的城市化和建立了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目前的日本只要能够把经济增长率恢复到3%左右就可以了，过高的增长率反而会引引起经济波动。其它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体制的原因也难以

<sup>14</sup> 许多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都由于经济危机而产生政治动乱。

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对于这种扩张性方法的可行性是需要充分论证的。

第一，这种高速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货币化过程的要求。目前中国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方面联系到尚未货币化的60%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联系到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两个方面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运行的关键。因此，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可以从根本上调节导致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目前中国经济中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突出地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目前中国的技术水平来讲，所有基本消费品的产量完全可以大幅度增长而不受资源的约束，城市化和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受技术约束，而只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这种有效需求约束表现在资产值对工资的比例和收入分配中工资的比例上，但就中国尚有60%的农村人口而言，提高总量的增长率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速度可以极大到改变上述比例关系。在未来的15年中，如果经济增长率能够稳定在20%左右，到2020年可以使中国的农村人口降低到40%左右，从而基本实现城市化。只有这种高速增长和农村的城市化才能实现中国现有的消费品生产技术的国内需求，使农村人口和城市的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国目前完全可以生产的现代消费品，而城市化的发展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途径。这种总量的扩张可以在短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对于缓解目前由于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乃至绝对收入水平下降引起的社会矛盾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种高速的名义GDP增长率对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出口是重要的，唯此才能保证中国的贸易利益和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把名义GDP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调整结构。

第二，在市场经济中，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是由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构成的货币投入产出的流转，在内生的货币供给条件下，这种货币流转取决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居民收入的支出流向。在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依然牢牢控制着中国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转，因此，通过政府的政策完全可以改变货币流转的方向。当前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这个阶段，依靠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制度法规来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是极端重要的。前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表明，在货币化的过程中依靠政府的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实现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而依靠自发的市场势力来建立货币金融体系则是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因为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货币金融体系是把农村作为“边缘”对待的，发达国家在早期的货币化过程中不仅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且引发过严重的社会矛盾，拉美国家的货币化过程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我们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货币化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本身包含的矛盾极易产生两极分化、货币拜物教和人的异化，从而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货币化进程，通过政府的作用加速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对于缓和这种矛盾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表明的是，依靠政府的作用来建立货币金融体系决不意味着用财政替代货币，而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

如上两个方面所表明的，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调整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和结构矛盾是更容易实现的。

#### 参考文献：

- 柳欣：1994，《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柳欣：2003，《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  
柳欣（主编）：200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人民出版社。

- 柳欣 2006,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人民出版社。
- 柳欣 郭金兴 王彩玲: 2006, 《资本理论与货理论》, 人民出版社。
- 柳欣 陈祥 靳卫萍: 2006, 《货币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
- 柳欣: 1999a,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经济研究的一种新方法”, 《南开经济研究》, 1999 (5)
- 柳欣: 1999b, “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 《东岳论丛》, 1999 (3)
- 柳欣: 2000, 《宏观经济: 一种新的货币经济理论》,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论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 柳欣: 2000, 《资本市场理论与模型》,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论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 柳欣: 《资本理论: 总量与相对价格》,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2 卷第 1 辑。
- 柳欣 郭金兴: 2005, “总量增长、结构调整与就业问题”, 《经济学动态》2005 年第 3 期
- 樊苗江 柳欣: 2006, 《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 人民出版社。
- 王潞 柳欣: 2006, 《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 人民出版社。